



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中國語言學史

[韓國] 李炳官 金鉉哲 朴聖鎬 著
李圭甲 金愛英

[中國] 雷漢卿 胡翠月 譯

四川
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014038791

H1-09
13

文學『二十一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語言學史

「韓國」李炳官 金鉉哲 李圭甲 金愛英 朴聖鎬 著

「中國」雷漢卿 胡翠月 譯



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二五」規劃2011年度後期資助項目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北航

C1726233

H1-09
13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語言學史 / [韓國]李炳官 金鉉哲 李圭甲
金愛英 朴聖鎬著. [中國]雷漢卿 胡翠月譯 一成都:
巴蜀書社, 2013. 9
ISBN 978-7-5531-0267-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漢語史—語言學史—
教材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20290 號

中國語言學史

Zhongguo Yuyanxueshi

[韓國]李炳官 金鉉哲 李圭甲 金愛英 朴聖鎬 著
[中國]雷漢卿 胡翠月 譯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24.5
字 數	590千
書 號	ISBN 978-7-5531-0267-2
定 價	72.00 圓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譯者前言

中國語言學史有着悠久的研究傳統和獨特的發展規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國內出版了多部語言學史研究著作，有些已經被其他國家翻譯並作為大學教材使用，如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濮之珍老師的《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和胡奇光老師的《中國小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先後被翻譯成韓文出版並當作大學中文系的教材。隨着漢語言學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國外學者開始關注中國語言學史的發展並開始編寫教材。韓國李炳官等五位教授共同撰寫的《中國語言學史》就是目前國外學者所撰寫的關於中國語言學史的通論性著作，其學術價值略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彌補了目前國內語言學史著作的一些不足並填補了空白。如第六章專設“古文字學的開始——金石學”一小節，認為宋代的金石學不僅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國文字學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並將宋代的金石學著作按照

內容和體例分為四類加以介紹。對此，國內語言學史著作幾乎都忽略不提，祇有何九盈先生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第四章“唐宋文字學”一節後列有“金石之學”一節，惜未能展開討論。

目前國內的中國語言學史著作大致分兩類：一類是“古代語言學史”（或稱“中國小學史”），一般祇介紹從先秦至清代的語言研究；另一類則命名為“中國語言學史”（或稱為“漢語語言研究史”），但對“五四”以後的漢語研究情況的介紹失之簡略。本書第十章題目就叫“現代”，共分七小節加以介紹。比如第三節“文字學”部分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情況的介紹十分詳細，國內的語言學史著作對此往往失之簡略。第七節“語法學”之現代語法的發展歷史部分在介紹“文化大革命”後至今的研究情況時特設“比較語法領域”一節，從與臺灣、香港等地的比較、與韓國語的比較、與其他外語的比較三方面加以介紹。本節第二部分“中國本土以外其他地區的中國語法研究”除介紹臺灣學者周法高的語法研究以外，還介紹了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如臺灣師範大學許世瑛的《中國文法講話》、戴璉璋的《今文〈尚書〉指稱詞研究》，以及被稱為語法研究新學派的湯廷池的《國語變形語法研究》、《國語語法研究論集》，還有曹逢甫的《主題在國語中的功能研究》、董昭輝的《從“現在完成式”談起》、鄧守信的《漢語主賓位的語義研究》和《漢語及物性關係的語義研究》、湯廷池的《漢語詞法句法論集》和《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國內的語言學史著作一般祇介紹周法高，其他學者的

研究情況則付之闕如。至於本節的“日本的中國語法研究”和“美國的中國語法研究”，則更是國內語言學史著作從未論及的新內容。在第十章第六節所介紹的徐芳敏的《〈釋名〉研究》、姚榮松的《〈釋名〉聲訓探微》和《上古漢語同源詞研究》也都是被國內其他著作所忽略的研究成果。

第二，學術觀點鮮明。對所介紹的語言學著作能夠立場鮮明地指出其優缺點。在第三章談到漢代訓詁時指出：“漢代的訓詁學家對後代的訓詁學可以說影響極大，但漢代的訓詁學不是沒有任何缺點的。漢代的訓詁學家們，即儒學家們祇熱衷於儒學經典的訓釋，而對其他領域的著作卻置之不理。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由於當時整個社會重視儒學的緣故，而且這種偏重儒學的風氣一直延續到後代。同時，雖然他們提倡實事求是，一個字一個字仔細地推敲分析這一點十分卓越，但卻沒有建立起總括全體的體系或者理論。”在介紹《說文解字》時除了指出其不足外，還專門指出了《說文》錯誤的部分：即字形分析不正確、意義解釋不正確和對“六書”分類不正確三種情況。在第十章，作者對現代中國音韻學研究所存在的問題表現出了對學術發展現狀的憂慮，指出：“正如前面所說，現代中國音韻學在這不長的時間裏，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不能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對現代中國音韻學的問題進行歸納的話，可以簡單歸納為兩點。其一是音韻學研究人才的問題。現代中國音韻學界最嚴重的問題是人才的培養問題。其二是與出版相關的問題。音韻學本身不容易受到大眾的喜愛，這使得出版界產生了迴避出版音韻學著作的傾向。”雖

然現在學術著作出版的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相對於其他學科而言，傳統語言學尤其是像音韻學這樣專業的學問，對其研究著作的出版還是存在不少出版方面的困難或阻力。

第三，本書的研究方法值得稱道。目前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大致有三種方法：一是單純地按照歷史發展順序分析各朝代特徵的方法。即按照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歷史朝代的順序敘述語言學的發展過程。這一方法按照時代的順序進行敘述，雖然有其長處，但對於各個時期語言特徵的敘述卻不足。因為語言的發展並不是隨着王朝的變化而隨之馬上變化的，也不是依靠某種力量而發生變化的。二是按照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進行介紹，如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把中國語言學分為以訓詁為主的時期（先秦—漢），以韻書為主的時期（漢末—明末），文字、聲韻、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清初至《馬氏文通》出版），還有西學東漸時期（1898—1949）等四個時期。這種按照某種特徵將歷史時期重新分類的方法雖然好，但對於各個時期的劃分，作者個人的主觀性太強。三是以上兩種方法的折中，即以中國語言學的發展過程為中心，在與其特徵不發生大的違背的情況下，按照朝代儘量將一個時代的區分簡易化。從本書序言可知，編寫者是在仔細閱讀了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濮之珍老師的《中國語言學史》和胡奇光老師的《中國小學史》以後，對三本著作的優劣進行討論之後纔着手編寫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有創新，主要表現在：形式上，為了讓內容簡明易懂，按

照朝代順序來劃分時代；內容上，按照不同的領域將中國語言學各領域發展過程分開進行說明。所以，當語言學某個領域由於朝代的原因出現了糾結在一起的情況時，盡可能地將其按照訓詁學、文字學、音韻學等方面一一進行敘述。而且，用很多篇幅介紹了國內有關語言學史著作涉及很少甚至幾乎沒有提及的現代部分。

第四，具有學術創新精神。這一點可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首先，指出了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有關課題。如在第十章“現代中國方言學的課題”一節指出了中國方言學的課題：（1）要對一個方言點進行深度的研究。今後有望進行深度的方言點調查，出現更多的諸如《昌黎方言志》或《蘇州方言志》這樣的作品。（2）向地區方言的綜合研究邁進。對一個方言點進行深度研究的同時，還要對更廣地區的方言區進行綜合的比較研究。（3）期待以各種文獻資料和現代方言調查資料為根據的“中國語方言大辭典”和綜合記錄國內方言分佈的“中國方言地圖集”等的出現。（4）比較各種方言的比較語音學、比較語法學、比較語彙學等著作或中國方言學概論、研究方言學歷史的中國方言學史等著作的出版也是擴大方言學基礎的必要工作。

在第十章第六節提出了“現代中國語源學研究的課題”：（1）對語言學研究中所利用的基本用語要給予明確的規定，在實際的運用中也要有一貫性。例如對同源字、同源詞、異體字的定義因學者而異，這就給研究者帶來了混亂，學者的定義也不盡完全。（2）以往的語源研究祇局限於書面資料，當然這些書面

資料非常重要且不容忽視。除書面資料外，還要關注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的借用語、同源詞，祇有這樣纔能建立更具概括性和正確性的語源關係。特別是通過被稱之為親族語的藏語與漢語之間的比較，建立比較語言學層面上的同源詞族體系。(3) 重視理論的研究。認為語言研究方面第一步要做的是古音體系的統一，這是因為祇有古音理論清晰明瞭，同源字判定基準纔能更準確而客觀。

其次，有些章節的設計頗具學術研究價值。如第九章第二節“訓詁學”部分專列“讀書記”一類，突出了清代學術筆記的語言研究價值。目前的語言學史著作幾乎都未論及歷代學術筆記的語言研究價值，祇有趙振鐸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2000)第四章設立“筆記裏的語言學問題”一節，難能可貴。第五節“方言學”在“方言的研究”一節之後專列“俗語研究”，介紹了東漢服虔的《通俗文》、宋代龔頤正的《釋常談》、明代陳士元的《俚言解》、張存紳的《雅俗稽言》、陸嘯雲的《世事通考》、周夢暘的《常談考誤》以及清代翟灝的《通俗編》、錢大昕的《恒言錄》、顧張思的《土風錄》、郝懿行的《證俗文》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是目前所見到的國外學者集體撰寫的第一部中國語言學通史，對其觀點的介紹將會進一步促進國內學者對中國語言學史的關注和研究，又可作為高校中國語言學史課程的教學參考書，激發學生對語言學史的學習和研究興趣。

當然，作為一部外國學者集體撰寫的著作，面對上下幾千年浩瀚的中國語言學文獻，總難免存在一些不足，有些很明顯屬於

印刷錯誤。我們在翻譯時作了以下幾方面的校訂和補闕工作：

一、改正訛誤字。作為一部外國學者集體撰寫的傳統語言學史，涉及大量傳統語言學文獻，在引用原文時或出現文字錯誤在所難免。翻譯時本着對原作負責的態度，除了對引文逐條核查原書加以校對外，對一般術語和人名、書名（篇名）等訛誤一一作了訂正。

二、補充脫漏內容或補足文句。如 9.5.3.4 “郝懿行的《證俗文》” 部分在敘述其篇目時遺漏了“第八卷典制”，譯稿作了補充。10.3.2.3 在“簡帛”後的括弧中說明“寫在綢緞上的文字”，翻譯時補充為“寫在竹木片和綢緞上的文字”，以求更為準確。

三、個別地方以按語的形式給予補充說明。如在 6.3.3.1 “摹寫器物的樣子和銘文的著作”一節說到王黼編纂的《博考古錄》，但經查證未見此書，不知所據。又如 9.3.2.2 “甲骨文的研究”部分在引述董作賓、胡厚宣《甲骨年表》時的一段文字和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本子的記述有所出入，亦不知所據。以上都用“譯者按”加以說明。再如 10.6.1.5 在介紹徐芳敏《釋名研究》時提到了《讖緯》，但實際上《讖緯》並非書名，下加按語：“此處讖緯指方士化儒生附會儒家經典的各種著作的總稱，而非專門著作。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有《緯書集成》。”

四、更正引述錯誤。如 9.4.1.8 江有誥的古音學部分介紹《音學十書》：“《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子史

韻讀》、《漢魏韻讀》、《二十一部韻讀》、《諧聲表》、《入聲表》、《唐韻再正》、《古韻總論》等。除此之外還有《說文匯聲》、《唐韻四聲正》等。”但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根據渭南嚴氏賁園書庫精刻影印本和中華書局1993年據嚴式誨刻本影印本，所示正確順序應該是《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未刻）、《二十一部韻讀》（附《通韻譜》、《合韻譜》）、《諧聲表》、《入聲表》、《四聲韻譜》、《唐韻四聲正》。之後附錄了《說文匯聲》、《說文質疑》、《繫傳訂訛》、《等韻叢說》、《音學辨訛》。除此之外，江有誥另有小學著作《說文六書錄》、《古韻總論》、《江氏字學敘錄》、《唐韻更定部分》、《經典正字》、《隸書糾繆》等。徑直改正，刊謬補闕。

五、論述體例略有改動。如第十章以後10.2.1“訓詁學新方向的探索”列舉了許多訓詁學研究著作，為了行文的簡便，在翻譯時作為注文處理。又如10.7.1.3“第三時期興盛期：‘文化大革命’後至今”的第二小節“現代語法領域”列舉了系列研究論著，翻譯時作為當頁注處理以節省篇幅。

個別屬於中韓語言中用詞習慣的問題，如安大略湖博物館極東部之“極東”在翻譯時改為“遠東”，使之更符合現代漢語的表達。另外，書中引用的大陸學者的著作一般都引用臺灣地區出版信息，所以最早出版年份不一定準確，如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195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作者引用臺灣人民書局、里仁書局1982年版。翻譯時未加改動。

以上就翻譯過程中所作的校對工作略作歸納，希望能夠成為

原著的“諍臣”，但由於譯者水準所限，一定有不少闕漏之處，懇盼原作者和讀者予以指正。

翻譯的過程就是重溫中國語言學史的過程，校對更是要面對每一部具體的著作，重新展開交流和對話，期間的收穫和喜悅自不待言。在校對的過程中突然發現眼力已不及前些年，雖不敢言老，但難免有白首方悔讀書遲的慨歎！

這本書能够最終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我的合作者大連外國語大學韓國語系的胡翠月副教授，是她在教學之餘用了兩年時間堅持將全文翻譯出來，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其敬業精神令我感佩！這一點可從“譯者後記”窺見一斑。沒有她的堅持，本書的翻譯很有可能半途而廢。從2008年3月初稿翻譯出來到現在又過了五個年頭，期間因為我無法保證及時修改而耽誤了正常出版，深感內疚！

譯稿到現在雖說進行過多次修改，但我心裏惴惴不安，由於漢語和韓語兩方面水準的局限，一定有不少曲解作者願意的地方，文獻引文的校對更難保證準確無誤，再次懇請五位原作者和讀者指正。

感謝韓國西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的金鉉哲教授的慷慨相助。記得2012年5月我寫信給金鉉哲教授，請他徵求五位韓國教授的意見，希望允許我們將他和其他四位教授合著的《中國語言學史》翻譯成中文，金教授很快回復並表示同意，並且告知6月2日將來四川師範大學訪問，屆時會把授權書帶過來。6月4日在成都見到金教授的時候，他把五位作者簽名的授權書交給了

中國語言學史

我，上面簽署的日期是 2012 年 5 月 30 日，可見他們早已允諾，我的顧慮都是多餘的。

同時還要感謝韓國交通大學東亞文獻研究所的朴英綠教授和當時在韓國高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林麗老師，他們得知我的想法後給我以鼓勵並積極幫我聯繫原作者，為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 2013 年中秋節即將到來之際，謹以這本韓中兩國語言學者合作完成的著作獻給所有關心並有志於傳承中華文化的人們，祝願他們心寬體胖，幸福美滿！

2013 年中秋佳節於四川大學望江樓畔

序 文

1992年10月22日，這天正值此書共著者之一的朴聖鎬教授結婚紀念日，正是在這樣一個對於朴教授來說非常有紀念價值的日子裏，我們開始了此書的撰稿。

1988年我開始在公州師範大學任職，每當開始教“中國語言學史”的時候，總覺得有些缺憾，那就是到當時為止，還沒有一本用我們韓國語所著的《中國語言學史》。為什麼以《中國文學史》命名的書名就有好幾頁紙之多，而以《中國語言學史》命名的書連一本都沒有呢？雖然當時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已經翻譯成韓國語並且出版，而且作為教材使用着，但學生們的反應是雖然這本書被翻譯成了韓國語，但有些段落甚至比原文用漢語寫的還要難以理解。

眾所周知，王力先生被公認為中國20世紀研究語言學的大師。讀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能夠讓人感受到作者運用其高深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將其祖國的語言學史一筆揮就。正

因為是語言學大師，所以在王力先生所著的《中國語言學史》中，一些從王力先生角度來說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說明的常識性的知識，沒有做基本的解釋，祇是單純地作為本論部分處理了。對此，我在讀此書的時候偶爾會有“這算不算是大師的一個疏忽，一個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的疏忽”的感覺。因為對於想學習中國語言學的初學者來說，在讀此書的時候會感覺到棘手，這點從大學生們閱讀用韓國語翻譯過來的內容都不理解是什麼意思就可得到證明。這不是作者的失誤，也不是翻譯者的失誤，原因在於王力先生是將其自身所具有的學識融匯成精華注入了書中，翻譯者則按照原文的內容將其翻譯成了韓國語，祇是書中的內容對於我們韓國學生來說需要進行詳細的補充說明，這樣纔能使學生理解中國的語言學史是怎麼回事兒。當我經歷了三四年這種遺憾和缺陷的感覺之後，終於有了“那麼我來用韓國語試着寫一本《中國語言學史》”的想法。

當時，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這本書之外，還有濮之珍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1987）和胡奇光先生的《中國小學史》（1987）出版面世。現在以“中國語言學史”命名而出版的著作的書名就有兩三張紙那麼多，但20世紀90年代初以《中國語言學史》命名出版的著作^①，在中國國內也祇不過是以上所提及的三本而已。所以剛過而立之年、初出

^① 譯者按：以上著作分別出版於1981年和1987年，故“20世紀90年代初”準確說來應當是“20世紀80年代”。

茅廬的教授想執筆“中國語言學史”，連我自己都認為有些勉強。但是我仍然覺得“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當作是學習，一邊整理，一邊慢慢試着寫”。當這種想法明確了的時候，正值朴聖鎬教授結婚之日。

婚禮結束，新婚夫婦離開後，我向聚集在一起的語言學專業的學弟們提議找個地方喝杯茶，以此為契機將我的想法即一起撰寫《中國語言學史》的提議說了出來。雖然當時在場的人如今都已成為教授，但當時作為博士研究生的學弟們都覺得不太可能。“我們真的能行嗎”、“我們具有那樣的實力嗎”、“如果師兄寫的話，我們可以幫忙”等，各種反應都有。我認為當務之急應該喚醒師弟們的自信，雖然當時的情形我現在記不太清了，但我們當時的談話大致如下：

不知道大家現在是不是認為自己還是在學習過程中，所以對寫這本書不太自信。但我認為，大家寫這本書，其實就是作為少壯學者應該做的事情。在此過程中如果你的實力還是停留在學生的水準上，那就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能不能寫書的問題了。

大家就把寫這本書當作學習吧，反正活到老、學到老嘛。你們說幫助我寫？雖然現在在座的所有人中，祇有我一個人是教授，而各位都是學生。但當這本書完成的時候，各位都會成為教授的，那時候說不上到底是誰幫助誰呢。再說，寫這本書並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是我們這些學習中國語言學的學者們共同的義務。我們能行，不要着急，祇要一條一條地認真

地整理，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聽完我的話後，我的學弟們半信半疑地回答道：“明白了。”之後我們結束了聚會。新婚旅行結束後，朴教授聽了我的想法，肯定地答道：“好。”除了與教會有關的事情，對其他事情都不太積極的朴教授，這次卻出乎意料地對我的建議這麼爽快地給予肯定的答覆，這對於那些還處於搖擺狀態的學弟們下定決心一起合作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我那天在學弟們面前拿出了三本書，就是上面我所言及的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出版發行的那三本與中國語言學史相關的書^①。然後我告訴所有在場的學弟：“現在，什麼都不需要，首先用一年的時間讀透這三本書，然後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再聚。”

一年之後，我們又聚在了一起，當我們再次相逢的時候，我們對於此間所讀的那三本書的長短處進行了討論。話題很自然地就轉換到了“因此我們應該這樣寫”的方向上來。那時我們對自己着手要撰寫的著作的要點總結為以下幾點：（1）從形式上，為了讓讀者便於理解，決定按照朝代的順序區分；（2）從內容上，按照中國語言學各領域的發展過程，對各個領域分別進行說明；（3）當遇到語言學某個領域由於朝代的限制被捆綁在一起的時候，要把這部分內容作為訓詁學史、文字學史、音韻學史這樣一個整體來處理；（4）大部分有關語言學史的著作幾乎沒有

^① 譯者按：“90年代”當為“80年代”。見第2頁注。